

鲁迅与生物进化论

刘再复 金秋鹏 汪子春

一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传入中国比较晚。首先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的是严复。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原强”一文,这篇著名的论文,一开始就推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年,他译述和出版了《天演论》,把生物进化学说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天演论》的翻译和出版,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布起了一定的作用。鲁迅当年一开始接触《天演论》,就深深地被书中所阐述的生物进化论这个新颖的科学思想所吸引。

但是,严复当时对生物进化论的了解并不深入。他所翻译的《天演论》不是当时欧洲宣传生物进化的主要著作。它并没有把当时各国在发展达尔文学说上的成就概括进去。再者,达尔文学说最初传入中国,就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所有这些,都影响了人们对生物进化论的真正理解。《天演论》出版后,虽然在社会上震动很大,但真正理解“进化”二字的含义的人,却不多。正如鲁迅早年在“人之历史”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迹日(近来——笔者注,下同),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赶时髦的人,以此来装璜自己的文章),而笃故者则病侏人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那些守旧的人则认为把人同猿猴同归一个类是不应该的,因此极力反对)。”可见,在二十世纪初年,许多人对生物进化论的精神实质,还是不甚了解,至于那些顽固守旧的人,反对这个学说,更是不奇怪的。

鲁迅对生物进化论的了解,比之当时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思想家要深刻和广泛。他以高度的革命政治热情,综合了当时生物学上的新成就,写了许多很有生气的文章,热情宣传生物界变化发展的思想,并通过这种宣传,有力地传播了进化论,唯物论,无神论,打击了唯心论、神学迷信和形而上学思想。

1903年,鲁迅在《浙江潮》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按照地质年代,生动地描述了地壳的变迁和生物在地质年代上分布的变化,指出“石类既自少而至多,生物亦由简以进复”,说明整个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和无机界)都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

1906年,鲁迅编写出版了《中国矿产志》,在“地层之播布”这章中,他根据古生物学上的材料,叙述了以化石划分地层的原则,介绍了不同地层中的不同化石分布,实际上是用进化观点,阐述了地球的发展与生物的发展历史。说到“原始层”,鲁迅特别指出,虽然人们当时还没有发现比三叶虫这种动物更为原始的动物化石,但是根据原始的出现在先、高等的出现在后的生物进化发展规律,推测一定还有比三叶虫更原始的动物与三叶虫同时生活着。他说:

“三叶虫者,动物之高等者也,按进化说,则劣者必先,优者必后(原始的出现在先,高等的出现在后),故意者尔时亦非无至劣动物,生活其间,特遗蜕模糊,莫能辨识耳。”

1907年,鲁迅写的“人之历史”,是专门介绍生物进化论的文章。在这篇重要的论文中,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论述在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历史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的斗争过程,揭露唯心论的荒谬和它阻碍进化论的形成的罪恶,指出进化论的创立,是“自破神造说始”,是唯物论的胜利。鲁迅在这篇论文中还提出“有生始于无生”的重要论点,用生物进化的历史事实批驳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鲁迅还特别注意化石对于证实生物进化规律的作用。他说:

“盖化石者,太古生物之遗体,留迹石中,历无数劫(世代)以至今,其形了然可识,于以知前世界动、植之状态,于以知古今生物之不同,实造化之历史,自溯其业于人间者也(实在是大自然在发展的过程中,自己创造了业迹,留给人类).”

鲁迅认为,通过对化石的研究,可以知“古今生物之不同”,这样一来,所谓“创造以来无增减变迁之说(生物自上帝创造以后,就永久固定不变,既不增加也不减少的说法)遂失当”就站不住脚了。

在“人之历史”中,鲁迅对爪哇猿人化石的发现,非常重视,并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

“近三十年来,古生物学之发见,亦多有力之证,最著者为爪哇之猿人化石,是石现(猿人化石的发现),而人类系统遂大成(这样人系统进化的各个环节,就可以描绘出来了)。盖往者狭鼻猿类与人之系属,缺不可见,逮得化石,征信弥真(以往没有发现联系狭鼻猿和人类之间是什么样的生物类型的化石证据,现在获得了猿人化石,证据确凿无疑了),力不逊(其作用不亚于)比较解剖及个体发生学也。”

1891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在爪哇发现了具有猿和人类中间特征的猿人化石,许多人都认为爪哇化石猿人是联系人类和猿类的极重要的过渡类型,是从猿进化到人的重要证据。然而反对进化论的人总是极力贬低猿人化石发现的意义,否定它是从猿到人进化的证据。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1921年中国猿人化石的发现为止。而鲁迅很早就对爪哇猿人化石的发现及其在论证人类起源上的重要意义,正确地给以肯定和评价。

古生物学上的材料,是生物进化的最直接证据。它能反映出生物进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以对论证生物界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在二十世纪初期,我国许多人对古生物学还比较陌生,因此很少有人从这方面去论述和宣传生物进化的观点。鲁迅在这方面的许多论述对普及古生物学知识,加深对生物进化论的理解,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人之历史”中,鲁迅还着重介绍了海克尔的种族发生学,这对进化论早期在中国的传播,有重要贡献。鲁迅在文章的开头说,“黑格尔(今译海克尔)者,犹赫胥黎然,亦近世达尔文学说之讴歌者也,顾亦不笃于旧,多所更张(没有停止不前,在达尔文学说基础上多有所发现).”

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海克尔通过几年的研究,总结了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个体胚胎学和比较胚胎学的丰富材料,建立了种族发生学,即生物种系的发展史,创立了生物进化系图。海克尔还提出了生物科学上的一个重要定律——生物发生律,又叫重演律。根据“重演律”,个体发育史就是生物种系发展史的短暂迅速的重演,或者说:胚胎发育史就是种系发展史的精简和缩短的重演。个体发育反映了生物种系的发展。生物发生律的发现,是对达尔文学说的重要发展,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极为重要和令人信服的论据。鲁迅是第一个将这种对宣传和普及达尔文学说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介绍给中国人民的。在“人之历史”一文中,鲁迅根据生物发生律,论证了生物界的演化。他说:“凡个体发生,实为种族发生之反复(重演),特期短而事迅者耳(只是时间短,变化快).”他继续说:“以此法治个体发生(用这种理论研究个体发育)知禽

兽鱼虫、虽繁不可计，而溯推本源，咸归于一（便知道地球上动物种类虽然多得不可计数，但追其历史，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又以治种族发生（再以这种理论，研究种族发生）知一切生物，实肇自至简之原官，由进化而繁变，以至于人（便知道一切生物，都是从最简单的原始有机物发展来的，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成复杂的生物以至进化到人）。”鲁迅还以人的胚胎发育为例，指出：人的胚胎发育是从受精卵开始的，受精卵就象动物界中构造简单的单细胞动物“阿弥巴”，经过分裂由单细胞发展为多细胞，这样的多细胞结构，就好象低等动物班陀黎那，继续发展，形成原肠，它相当于原肠动物水螅。人的胚胎继续发展，出现鱼鳃，此时的胚胎相当于动物界的鱼类。此后人的胚胎继续发展，与人类以外的其他高等动物的胚胎发展没有两样，即使胎儿已发展到具有脑髓耳目及足，也很难与其他脊椎动物的胎儿相区别。人的胚胎发育为人类起源于动物提供了鲜明的证据。

在论述了人的个体发育之后，鲁迅又叙述了脊椎动物在地质年代上的分布顺序。他说：

“凡脊椎动物之始为鱼类，见地质学上太古代之侏罗纪（古生代志留纪），继为迭逢纪（泥盆纪）之蛙鱼（原始两栖类动物），为石墨纪（石炭纪）之两栖，为二迭纪之爬虫，及中古代（中生代）之哺乳动物，递近古代（新生代）第三纪，乃见半猿，次生真猿，猿有狭鼻族，由其族生犬猿，次生人猿，人猿生猿人，不能言语，降而能语，是谓之人。”

鲁迅认为脊椎动物在地质年代上的这种分布已为比较解剖学所证明，也与人类的胚胎发展次序相似。恩格斯指出：“**有机体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植物和动物在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

鲁迅根据海克尔的种族发生学理论，综合了胚胎学和古生物材料，论述了从原始单细胞动物到人类的整个系统发展，唯物地阐明了人类的起源。

二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认为生物界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它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突然出现的，更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自然条件的作用下，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逐步发展所形成的。达尔文学说对生物界的发展，作了科学的解释，它推翻了长期统治生物学领域的“神创论”、“目的论”、“物种不变论”等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所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物种起源》出版后，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阅读了这本书，并给以充分的肯定。马克思指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

资产阶级改良派首先在中国介绍了进化论。他们作为十九世纪末年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面对中日甲午战争后祖国将被瓜分的严重灾难，心情焦急，感到民族危亡应当拯救，国家的状况需要改变。他们寻找变革的理论根据，终于从西方找到生物进化论。他们通过这种理论说明：生物不断地“变”，不断地进化，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社会也是如此。中国需要“变”落后为先进，“变”法救亡是合理的。由于进化论与当时不甘受人宰割、渴求发展图强挽救民族危亡的先进的中国人的愿望相吻合，因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便迅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思潮。迫切希望落后的祖国能够变化的年青的鲁迅，不能不被这种为变革而呐喊的舆论所吸引。

作为进化论介绍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想通过介绍生物进化论来激发中国人奋发图强，改变中国的现状，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改良派在政治上却没有达到旧的一

定要灭亡的革命结论。他们在理论上陷入了庸俗进化论的泥坑,否定质变,认为“物变至微,真迁极渐”是事物发展的真正法则,鼓吹变革“不可期之以骤”。这种理论导致改良派后来演出向封建营垒投降的历史悲剧。曾经混入“五四”文化革命统一战线中的胡适,也大肆鼓吹庸俗进化论,在政治上得出“一点一滴”改良的臭名昭著的结论。而鲁迅则与他们截然不同。他从生物进化论中汲取了吐故纳新、发展变化的辩证因素;在政治上达到否定旧制度,扫除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旧事物的革命结论。他相信斗争是自然界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斗争推动了生物界的发展,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根据这些基本观点,结合自己的斗争实践经验,鲁迅一直把革命和进步联系在一起。鲁迅认为人类社会也总是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他说:“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使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零落,……若诚能渐致人间,使归于禽虫卉木原生物,复由渐即于无情,则宇宙自大,有情已去,一切虚无,宁非至净,而不幸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繁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在这里明确指出,人类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强使飞出去的箭再飞回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鲁迅还说:“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攫,……有人攫人,或有人得攫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尖锐地揭露,正是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其反动的统治,才宣扬停滞不变的理论,才掩盖矛盾,反对革命和斗争。年青的鲁迅,从生物进化论中汲取了革命的内容。到了“五四”时期,鲁迅的革命锋芒更加鲜明,他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坟·灯下漫笔》),他还说:“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的是扫荡废物。”(《出了象牙之塔·后记》)改革,要的是革命的“扫荡”,而不是点滴的改良。实际上,鲁迅也正是以“扫荡”来对待一切旧事物,对待一切反动派的。他无愧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同改良派不同,鲁迅又是坚决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定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根本区别。他们阉割了生物进化论的革命内容,别有用心地将动物界发展的规律硬套在人类社会中来,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只是互相残杀、互相吞食的动物界;弱肉强食、强凌弱、富压贫都成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宣扬“剥削有理”、“侵略有理”的反动理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和传播有很大贡献的赫胥黎和海克尔就是这种反动理论的鼓吹者,甚至达尔文本人也参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一些活动。马克思不得不惋惜地指出:“很遗憾,查理·达尔文也让自己的名字加入了这个醒醒的示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1页)

包括严复在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理论上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信奉的。作为改良派的严复,他所编译的《天演论》,总的说来,它的前半部是唯物论的,宣传的是科学达尔文主义;后半部是唯心的,宣传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对全书的思想都加以接受,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深信不疑,他认为,生存竞争,“动植如此,民人亦然”。他企图从中找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把这种理论也当作“宝贝”。当然,严复当时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非鼓吹“侵略有理”,而是向中国人敲一敲救亡的警钟,想以此激发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他说:“万物存身于自然之中,优则胜,弱则败,此自然之理也。然其要在于竞一字,竞者所以奋发自强也。”(《严复未刊信稿》)他认为当时世界强国所以强,是从“竞”字中得来的,我们要求强国之道,也不能舍掉“竞”字。但是严复毕竟在理论上肯定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根本看不到这种理论的反动性,更谈不上对这种理论展开批判。

紧紧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鲁迅,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

充分反映了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这是因为鲁迅,他所以接受进化论,是把进化论作为一种破旧立新的武器,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作为一个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战士,为了对旧势力展开更有力的批判,他支持生物进化论,传播进化论,但拒绝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批判这种反动学说,他不能容忍帝国主义用这种反动理论为其侵略辩护。1908年,他在“破恶声论”一文中,曾痛斥“强”者持进化论的幌子对弱国进行侵略的罪恶行径。他把帝国主义者称为“兽性爱国之士”,并揭露他们说:“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嫌也。”鲁迅相信自然选择学说,但这里他把“进化留良之言”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盾牌而加以严厉驳斥。可见鲁迅反对把自然选择这个生物界的规律,硬套到人类社会来。

鲁迅从崭新的角度来理解生物进化论,他充分地从中汲取了革命的内容,并使它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鲁迅前期对生物进化论的信仰,使他坚定地相信进步,使他对祖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和斗争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说:“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热风·生命的路》)他相信生命在地球上总是不停地运动着、发展着,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他认为,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反动派想靠镇压革命阻止社会前进也是徒劳的,“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热风·生命的路》)

新的生物类型逐渐兴起和发展,终将代替旧的生物类型。鲁迅要人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努力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他讽刺那些妄想长生不老、永久压制进步的老顽固,说他们不过是“异想天开”,“是生物界的怪现象”。他批判那些压制新生事物,“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的封建复古主义者是“现在的屠杀者”,他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热风·现在的屠杀者》)

鲁迅努力地吸收进化论中具有辩证因素的发展观点,宣传人类总是要不断向前,激励人们勇敢地去争取更美好的将来。他说:

“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鲁迅告诉我们,现在的人类,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发展途中,一定会出现更近圆满的人类。到那时候,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人类,也不过是“类猿人”而已。鲁迅以此生动的人类进化的科学预想,号召人们要向前看,往前走。他说:“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要蔑视反动势力的“冷笑和暗箭”。到了1926年,那已是鲁迅思想质变的前夜了,这时,他常用生物进化的事例来说明新旧事物的更替是合理的,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必然的。他说:“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坟·写在“坟”后面》)鲁迅这里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中间类型作比喻,说明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在讲了这段话之后两个月,鲁迅又指出:“有了旧的灭亡,才有新的发生。旧的思想灭亡,即是新的思想萌芽了,精神上有了进步了。故不论新的旧的,都可以叫出来,旧的所以要灭亡,就是因为有新的,但若无新的,则旧的不亡了。”(《在广州中山大学欢迎会上的讲话》)鲁迅对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规律,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他从中得到革命的结论是必然的。

三

进化论对鲁迅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前期他把进化论的宇宙观作为自己观察社会和自然界的工具之一，并以进化论作为自己的一种重要战斗武器，给予守旧倒退的孔孟之徒和其他形形色色的顽固派、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鲁迅继续前进的时候，也受到了进化论的限制。生物进化论对自然界发展规律的说明，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人类社会和生物界毕竟有着本质的差别。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本身的特殊的规律。仅仅靠自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不可能科学地解释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文明史，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鲁迅从自己的斗争实践和进化论中，意识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是在矛盾和斗争中发展的，但他并不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他并没有从新旧的冲突中，看到矛盾的阶级本质。鲁迅在1919年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表示过这样的看法，他说：

“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热风·随感录四十九》）

鲁迅看到新旧的矛盾，看到新的总是要代替旧的，是很正确的。但是，他没有看到，新旧的矛盾的阶级实质，看不到在阶级社会里，必须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完成新旧事物的转化。因此，他得出的欢欢喜喜的和平进化观念就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了。任何旧事物，它的被消灭，被推翻，都是痛苦的，不经过激烈的斗争，不经过革命，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在人类社会，旧的反动阶级，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他们欢欢喜喜地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是不可能的。鲁迅当时由于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也就不能明确地用阶级观点分析一些问题，在观察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难免有“偏颇”。鲁迅这样用生物进化解历史，就不可能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解释仍然是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

但是，应当指出，鲁迅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并没有把自己的行动放在这个基点上。他从来也没有去等待旧事物“欢天喜地”地自动死亡，而是用勇猛的战斗去促使旧事物的瓦解。他清醒地认识到：“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头脑是清醒的，因此，当他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思想武器不能适应战斗的需要。复杂的社会现象，用简单的生命发展的规律去解释，行不通，许许多多的问题难以解决，他不能不对进化论感到怀疑。

在他的世界观产生质变的前几年，现实的阶级斗争一再教育着鲁迅，而鲁迅也一再向进化论提出挑战。1925年4月8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两地书》）对他一向“敬重”的青年，对青年必胜于老年的法则，他也提出疑问：“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华盖集·导师》）1926年底，那是鲁迅进行严格自我解剖，希望把以往的陈迹埋在“坟”里的年月，他更是用明确的语言对进化论提出挑战：“‘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

和环境所给与的命运。”(《集外集拾遗·新的世故》)排斥异己,取而代之,这已不是“欢天喜地”的进化,而是激烈的斗争,青年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异己”,这一思想已不象“青年必胜于老人”那么笼统了。但是,鲁迅这时还未能赋予“异己”以阶级内容,“取而代之”,还不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样明确的阶级斗争观点。

严酷的现实引起他对进化论的怀疑,但他又不可能一下子摆脱进化论消极方面的影响。这时,曾经作为他的主要思想武器的进化论,已经转化成为他继续前进的障碍。他思想上产生了许多矛盾,正因为这样,鲁迅在“荷戟”战斗的间隙,就不免发生徬徨苦闷之感。但是,鲁迅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并不掩盖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在与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用积极战斗前进来克服这些矛盾,在解决矛盾中不断前进。

当鲁迅处于思想矛盾的时期,鲁迅一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列主义的“火”来“煮自己的肉”,不断改造自己。一方面从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接受许多教育。1927年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大资产阶级投靠帝国主义,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的大屠杀,鲁迅亲眼看到这些残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四一二”事变中阶级斗争的残酷和“四一二”之后阶级关系的大变化,促使鲁迅从根本上认识到进化论的错误。进化论终于在他的头脑中“轰毁”。鲁迅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鲁迅终于在学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在阶级斗争的风风雨雨中,一步步深化对旧事物、对反动阶级本质的认识,一步步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从而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由进化论前进到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之后,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是,鲁迅对进化论这一学说并不是简单地抛弃掉,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统帅进化论。辩证唯物论包括进化论中具有辩证性质的发展观点,它克服进化论的局限,正确地说明量变和质变,渐变和突变的辩证关系,正确地把阶级观点和发展观点统一起来,从而使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规律达到完全科学的认识。由于鲁迅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观察、分析一切,因此,在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他始终站在反映历史前进要求的无产阶级一边,坚信新生事物必然战胜腐朽事物的真理,坚决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并达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光辉结论。鲁迅不仅在理论上把握住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且在实践中,以伟大革命家的姿态,为无产阶级的美好将来,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和一切阻挠历史前进的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战斗到最后一息。鲁迅的革命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习的。